

北大中文文库

袁家骅文选

做学问，拿出来的成果，应当是一块厚厚的砖头，要让后人看到，想从它上面迈过去，超越它也不容易。

做学问，要敢于超越前人，站到他们的前头去。

袁家骅 著 / 王福堂 孙宏开 编选



袁家骅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大中文文库

袁家骅文选

袁家骅 著 / 王福堂 孙宏开 编选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袁家骅文选/袁家骅著;王福堂,孙宏开编选.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0

(北大中文文库)

ISBN 978-7-301-17800-3

I. 袁… II. ①袁… ②王… ③孙… III. ①汉语-语言学-文集
② 少数民族-民族语-中国-文集 IV. ①H17-53 ②H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81269 号

书 名: 袁家骅文选

著作责任者: 袁家骅 著 王福堂 孙宏开 编选

责任编辑: 杜若明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7800-3/H·2639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zpup@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374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14 印张 202 千字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那些日渐清晰的足迹(代序)

随着时光流逝,前辈们渐行渐远,其足迹本该日渐模糊才是;可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有心人的不断追忆与阐释,加上学术史眼光的烛照,那些上下求索、坚定前行的身影与足迹,不但没有泯灭,反而变得日渐清晰。

为什么?道理很简单,距离太近,难辨清浊与高低;大风扬尘,剩下来的,方才是“真金子”。今日活跃在舞台中心的,二十年后、五十年后、一百年后,是否还能常被学界记忆,很难说。作为读者,或许眼前浮云太厚,遮蔽了你我的视线;或许观察角度不对,限制了你我的眼光。借用鲁迅的话,“伟大也要有人懂”。就像今天学界纷纷传诵王国维、陈寅恪,二十年前可不是这样。在这个意义上,时间是最好的裁判,不管多厚的油彩,总会有剥落的时候,那时,什么是“生命之真”,何者为学术史上的“关键时刻”,方才一目了然。

当然,这里有个前提,那就是,对于那些曾经作出若干贡献的先行者,后人须保有足够的敬意与同情。十五年前,我写《与学者结缘》,提及“并非每个文人都经得起‘阅读’,学者自然也不例外。在觅到一本绝妙好书的同时,遭遇值得再三品味的学者,实在是一种幸运”。所谓“结缘”,除了讨论学理是非,更希望兼及人格魅力。在我看来,与第一流学者——尤其是有思想家气质的学者“结缘”,是一种提高自己趣味与境界的“捷径”。举例来说,从事现代文学或现代思想研究的,多愿意与鲁迅“结缘”,就因其有助于心灵的净化与精神的提升。

对于学生来说,与第一流学者的“结缘”是在课堂。他们直接面对、且日后追怀不已的,并非那些枯燥无味的“课程表”,而是曾生气勃勃地活跃在讲台上的教授们——20世纪中国的“大历史”、此时此地的“小环境”,讲授者个人的学识与才情,与作为听众的学生们共同酿造了诸

多充满灵气、变化莫测、让后世读者追怀不已的“文学课堂”。

如此说来，后人论及某某教授，只谈“学问”大小，而不关心其“教学”好坏，这其实是偏颇的。没有录音录像设备，所谓北大课堂上黄侃如何狂放，黄节怎么深沉，还有鲁迅的借题发挥等，所有这些，都只能借助当事人或旁观者的“言说”。即便穷尽所有存世史料，也无法完整地“重建现场”；但搜集、稽考并解读这些零星史料，还是有助于我们“进入历史”。

时人谈论大学，喜欢引梅贻琦半个多世纪前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何为大师，除了学问渊深，还有人格魅力。记得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有这么一句话：“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其实，对于很多老学生来说，走出校门，让你获益无穷、一辈子无法忘怀的，不是具体的专业知识，而是教授们的言谈举止，即所谓“先生的音容笑貌”是也。在我看来，那些课堂内外的朗朗笑声，那些师生间真诚的精神对话，才是最要紧的。

除了井然有序、正襟危坐的“学术史”，那些隽永的学人“侧影”与学界“闲话”，同样值得珍惜。前者见其学养，后者显出精神，长短厚薄间，互相呼应，方能显示百年老系的“英雄本色”。老北大的中国文学门（系），有灿若繁星的名教授，若姚永朴、黄节、鲁迅、刘师培、吴梅、周作人、黄侃、钱玄同、沈兼士、刘文典、杨振声、胡适、刘半农、废名、孙楷第、罗常培、俞平伯、罗庸、唐兰、沈从文等（按生年排列，下同），这回就不说了，因其业绩广为人知；需要表彰的，是1952年院系调整后，长期执教于北大中文系的诸多先生。因为，正是他们的努力，奠定了今日北大中文系的根基。

有鉴于此，我们将推出“北大中文文库”，选择二十位已去世的北大中文系名教授（游国恩、杨晦、王力、魏建功、袁家骅、岑麒祥、浦江清、吴组缃、林庚、高名凯、季镇淮、王瑶、周祖谟、阴法鲁、朱德熙、林焘、陈贻焮、徐通锵、金开诚、褚斌杰），为其编纂适合于大学生/研究生阅读的“文选”，让其与年轻一辈展开持久且深入的“对话”。此外，还将刊行《我们的师长》、《我们的学友》、《我们的五院》、《我们的青春》、《我们的

园地》、《我们的诗文》等散文随笔集，献给北大中文系百年庆典。也就是说，除了著述，还有课堂；除了教授，还有学生；除了学问，还有心情；除了大师之登高一呼，还有同事之配合默契；除了风和日丽之时之引吭高歌，还有风雨如晦时的相濡以沫——这才是值得我们永远追怀的“大学生活”。

没错，学问乃天下之公器，可有了“师承”，有了“同窗之谊”，阅读传世佳作，以及这些书籍背后透露出来的或灿烂或惨淡的人生，则另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正因此，长久凝视着百年间那些歪歪斜斜、时深时浅，但却永远向前的前辈们的足迹，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

作为弟子、作为后学、作为读者，有机会与曾在北大中文系传道授业解惑的诸多先贤们“结缘”，实在幸福。

陈平原

2010年3月5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前 言

一 《汉语方言概要》导读

《汉语方言概要》是一部构建于历史语言学和描写语言学基础之上的论述性著作。丰富的方言资料大多是从口语中收集来的,现实而可靠。方言材料又多有适当的分析说明,不限于事实的罗列;而说明又考虑到各种可能性,不陷于武断。这种既有系统的材料又有适当论述的特点,使它不同于单纯调查报告型的方言著作。

全书共 12 章,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前三章是理论概述,介绍方言、汉语方言学和汉语方言发展简史。第二部分第 4 至第 11 章介绍汉语各大方言的概况,包括各方言形成的历史背景,代表方言的语音系统——声韵调系统、变音系统、古今语音比较和方言与普通话语音比较,以及词汇特点和语法特点。介绍中以语音为重点,词汇和语法的材料也具有相当的分量,做到了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兼顾。第三部分第 12 章综论,综合比较汉语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从中归纳汉语方言之间的亲疏关系。

本书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具有多个视角,比如从历史语言学的角度看待汉语方言的发展,从描写语言学的角度介绍汉语各大方言。第二是运用多种方法:即兼顾平面描写、平面比较和历史比较等方面。这种多视角多方法的考虑和做法,可以为读者提供有关汉语方言各个方面的知识内容和思考角度。

以下介绍本书前三章。

第一章 方言

本章介绍普通语言学关于方言、语言系属及语言发展等概念。

（一）方言的定义

对方言的理解历来有三个方面：一是语言的地方变体，二是不见于书面的特殊口语，不够文雅的土音，三是在语音、词汇、语法方面互有异同。按历史语言学的观点来看，方言是共同语的继承或支裔，有异于其他亲属方言的语言特征，在历史时期往往从属于民族的统一标准。

（二）语言的系属

十九世纪欧洲历史比较语言学建立了语言发展的历史系统和语言间亲属关系的概念：语系——语族——语支——语言——方言。印欧语系的构成已为人们所接受。汉藏语系的构成则还在探索之中。

语言的发展是在系属中的不断分化和整化的过程，有时一种是主流而另一种是潜流，有时两种作用互为消长或平行发展。语言或方言在尚未分化的共同时期的统一状态称之为共同语或原始语。在印欧语系中，这个共同语很少有历史文献可考（例如拉丁语之于罗曼诸语言），一般是虚构的。而汉语中像《诗经》音系、《切韵》音系、《中原音韵》音系则都是汉语史上保留下来的环节，虽然还需要补充和修正，但都不是虚构。这些共同语在汉语史上的重要性或价值自不待言。

（三）分化和整化的诸因素

语言的分化和整化就是方言的产生和集中或消磨。这方面发生影响的因素大致有以下几种：一是人们生活共同体的扩大与否，这是最基本的因素。如果人口增加，人们生活共同体扩大，扩大了的共同体内相距较远的居民往来减少，语言差异就会增加，从而形成不同方言。反之，人们生活共同体缩小，不同方言也会集中。二是地理因素。如山脉河流等对人们交往造成阻碍，语言往往分化成不同的方言。不过河流有时也有利于交通，可以促进方言的接近。三是集体迁徙。和平的移民，或武力的征战，常常使远离母体的一部分人的语言或方言发生变化，产生新的差异，形成不同的语言或方言。比如目前欧洲的芬兰语和匈牙利语就都是由乌拉尔地区迁出，经历分化后形成的。我国目前的客家话则是东晋时中原移民迁徙到南方形成的。四是语言间的同化。同化使一种语言归于消亡，另一种语言保存下来，但吸收了已消亡语言的某些成分，变得不同于其他亲属方言。

(四) 语言和方言的区别

区别语言和方言要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观察,而首先要从语音方面入手。区别语言和方言不应该凭借听得懂或听不懂的印象,也不应该受民族或地域名称的迷惑。汉语方言分为官话、吴语、湘语、赣语、客家话、粤语、闽语等七种,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第二章 汉语方言学

本章介绍我国汉语方言研究的历史。

(一) 《方言》的出现

人们在周秦时期已经注意到汉语方言分歧的现象。西汉时出现了扬雄写作的《辘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方言》。这是一部方言比较词汇集,经作者二十七年调查而成。收集的词语有词义解释及使用地区的说明等。如:

党,晓,哲,知也。楚谓之党,或曰晓,齐宋之间谓之哲。(卷一)

但汉以后直至清末,基本上没有这样以实际方言为调查对象的工作了。人们满足于利用文献材料考证方言中的古词语,方言研究成为经学的附庸。

汉语方言的基本词汇和语法结构大致相同。因此汉语方言词汇的研究集中在古词语的保存、创新及来源的考证等方面,和欧洲的方言研究注意词语的形态变化很不相同。

(二) 方言研究的方法

方言并非标准语的分支或歪曲,而是有自己的变化规律。因此,研究方言和研究语言的步骤是一样的。研究方言一般有三个步骤:一是调查和描写,二是与标准语比较,三是与较古的语言比较。其中第一项是描写语言学的工作,后两项属于历史比较语言学。

(三) 方言地理学

方言地理学是方言研究的特殊领域。它用地图来表示语言特征分布的情况。语言特征的地理分布会暴露语言发展过程中的许多重要情况,很多是文献所不能提供的。有的情况提供了“构拟”的根据。一个语言特征可以用同言线来表示。同言线的重要性不尽相同,而且各有

分布范围。

方言地理学和历史语言学相互促进,相互补充。活的方言提供了文献没有的证据,历史语言学的成果也可以作为方言研究的出发点。

第三章 汉语方言发展的历史鸟瞰

本章介绍汉语方言的历史发展。

(一) 研究汉语方言历史的前提

要了解汉语方言的历史,首先要了解使用汉语方言的汉族人民的历史。

秦汉以来,中国保持了统一的局面,表现了极大的稳固性。相关的历史条件是:(1)中央集权的政治体系,但有封建割据,以自然经济为基础;(2)文化传统富于保守性,有古典文学语言的传统;(3)文字具意象体系,各地按不同方音认字读书,有利于维系书面语的统一;(4)外族语言的影响较小,吸收外族语言的成分也较少。

(二) 上古汉语方言

自传说中的黄帝时起至夏商,我国还处在氏族社会,语言或方言也是与氏族或部落相联系的,不难想象其纷繁复杂。周王朝春秋战国时方言复杂的情况已有文献记载。书面语的语音系统则可以根据《诗经》的押韵来归纳。至汉时,许多先秦文献需要注解,说明周汉之间汉语已有一定的变化。《方言》一书的出现,提供了方言词语通行地区的第一手资料,据此可以了解汉代方言大致的类别和分布。

(三) 中古汉语方言

中古包括隋唐宋,以及稍早的过渡期魏晋南北朝。这一时期是近代汉语方言形成的重要时期。稍早三国时吴国开发江南,江南地区的吴语开始形成。西晋末年五胡乱华迫使大量中原汉族居民避乱南迁,是后来客家话和闽语形成的间接原因。唐代安史之乱和两宋时金元的南侵,又使大量中原居民南迁入粤,形成粤语。唐宋时闽人称“福佬”,说明闽语和吴语已经分化,各具特点。客家话南迁时经过江南吴语的江西地区,影响到当地的方言,是促使赣语形成的因素。

魏晋时颜之推等撰《切韵》,提供了当时中原方言的一个书面语语音系统。分平上去入四声,二〇六韵。这一语音系统有可能是当时南

北方方言的汇通,却也是汉语历史上第一次对实际方言所作的归纳。

(四) 近代和现代汉语方言

近代指元明清,现代指鸦片战争以后。在这 600 余年间,汉语方言的发展并无转折,可以作为一个时期来处理。

这一时期,北方中原地区的方言扩展并趋统一。中古以后汉语方言向西北发展。明代沐英平定云贵,北方话深入西南。清代把北方话传播到东北和内蒙古地区。随着王朝的变迁,汉语的中心地区也由河南、陕西转移到河北,北京话成为北方话的代表方言。

现代汉语方言实际上在中古时期都已萌芽,经历这 600 余年,就发展成为七个主要的地域方言,即官话(北方话)、吴语、湘语、赣语、客家话、粤语、闽语。其中吴语、湘语、赣语是在当地形成的,客家话、闽语、粤语则是中原居民南迁后形成的。官话无论从书面语还是从口语来说,地位的重要都远远超过其他方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普通话即以北京方言作为语音标准。吴语等其他六个方言则在各自的区域内活跃,并不断接受官话的影响。

二 《阿细民歌及其语言》导读

《阿细民歌及其语言》是一部专著,基本资料是作者 1945 年应云南路南县政府邀请,为该县编写县志而开展的调查研究。该书的第一章和第二章曾于 1946 年在南开大学出版的《边疆人文》第 3 卷第 5、6 两期合刊上发表。解放后,作者对资料作了全面整理,完稿后于 1953 年作为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辑的《语言学专刊》第五种出版。

阿细人是彝族的支系,分布在云南省路南县(现改名为石林彝族自治县)和弥勒县境内,使用的语言属藏緬语族彝语支,可划入彝语 6 大方言中的东南部方言。这一彝语调查研究是作者第一次接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历尽辛苦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实地调查研究,在收集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完成的描写性专著。全书共 245 页,16 开本,分四章,这里选录了该书的第一、二章。第一章实际上是这个语言结构特点的一个概要。第三章是民歌,也是本书的主干,占了本书的四分之三

的篇幅。第四章是词汇,约 3000 左右常用词,按声母次序排列成词表。

阿细话是彝语中很有特点的一个土语,与周围彝语有很大的差异。作者深入调查了这个语言点,在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进行整理和研究,尤其对阿细彝语的语音做了非常细致的描写。阿细彝语有 34 个声母,7 个单元音韵母,7 个复元音韵母,1 个双唇鼻音自成音节韵母,5 个声调。作者细致描述了辅音的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对音位变体一一进行了说明,每个声母各举出 2 至 5 个例证。对元音和韵母的描写尤其细致,举出的例证也更多。通过声韵母配合表,对元辅音的结合和各种元音变体出现的语音变体做了细致的有说服力的分析。作者将阿细彝语的声调归纳为 5 个,但是在文字说明中提到 44 和 21 调有肌肉松紧的区别(又叫喉塞声)。而且作者在 44 调和 21 调下面都用短横标出,说明已经注意到这个地区的彝语元音有松紧的区别,只不过未在元音上加以标出而已。这与同时在该地区调查研究彝语的李方桂和马学良发现撒尼彝语具松紧元音之别,有异曲同工之妙。^①

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分析了阿细彝语的音位系统以后,还为阿细彝语设计了一套拉丁字母的拼写系统——“文字草案”。这与新中国成立后为需要文字的少数民族创制新文字的思路基本上一致。作者为了证明该拼写系统是科学的,还特意用该草案拼写了长歌 30 余行作为样品。

作者的注意力主要放在收集大量诗歌上,以此为基础,整理了语法要点。作者省略了与其他地区彝语相同的特点,仅仅将阿细彝语语法 10 个主要特点(包括语序、主要词类等)做了举例说明。

在当时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界,这种深入的描写研究是很不容易的,尤其音位系统的描写,应当是当时几种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成果中较为深入的一种典范。

^① 详情见孙宏开《汉藏语系语言研究中的若干问题——访李方桂先生》,《中国语言学集刊》第二卷第一期,中华书局,2007 年。

三 论文一组(1)导读

论文一组(1)包括《窝尼语音系》和《峨山窝尼语初探》两篇文章。它们是作者在完成对阿细彝语的调查研究后的第二年,又去云南省的峨山县调查研究哈尼语的成果。这是中国语言学者首次调查研究哈尼语的一个支系语言。窝尼是哈尼的一个支系,窝尼语现属哈尼语豪白方言。^①

从这两篇论文所反映的调查经过,可以知道他在调查研究工作中所付山的巨大劳动。他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在峨山县城换了3个发音合作,人才完成了2000左右常用词和14个长篇故事的记录,并在此基础上整理出哈尼语的音位系统和语法要点。

这两篇相关的论文,可以说是姊妹篇,一篇是音位系统的详细描述,另一篇是语法要点,合起来就是一个语言的整体结构的面貌。

《窝尼语音系》对该调查点的语音的描写十分细致,其中包括对29个声母、13个单元音韵母、7个带后鼻音韵尾的韵母、22个复元音韵母和4个声调音值及其变体的详细说明,分析了各种元辅音出现的条件和归纳音位的理由。

《峨山窝尼语初探》(语法撮要)分1.词序;2.类词(指类别词或量词);3.人称代名词;4.指示代名词;5.状词(包括形容词和副词等);6.动作情态,实际上讲动词的各种语法特点;7.词与字等七个部分,介绍了窝尼语的语法特点。可以看出,这些基本语法特点是作者从记录的大批长篇语料中归纳出来的。

对一个完全陌生的语言,很快就进入角色,在短时间内完成全面描写研究是多么的不容易!遗憾的是作者仅仅发表了两篇论文,没有能像《阿细民歌及其语言》一样,将调查研究的全部资料整理成书出版。实际上从他收集的资料和已经做出的研究,是完全可以整理成一部哈尼语的专著的。

^① 详情请参阅李永燧、王尔松编著的《哈尼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6年。

四 论文一组(2)导读

论文一组(2)包括《广西壮语方言分布概况和创制文字的途径》、《壮族语文问题》和《坚持字母的汇通原则》3篇论文。它们是作者长期开展壮文创制工作中提出的一些基本经验和理论探索。我国许多少数民族没有文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民族事务的几项决定的第五项规定指出:要帮助尚无文字的民族创立文字,帮助文字不完备的民族逐渐充实其文字。1954年,政务院批复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教委员会民族语言文字研究指导委员会及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关于帮助尚无文字的民族创立文字问题的报告。批复中说:“关于帮助尚无文字的民族创立文字的办法,特责成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和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审慎研究,然后拟定计划和订出在一两个民族中试行。并应继续了解情况,及时总结经验,以便在事实证明这些办法确是可行,而且其他条件也比较成熟时,逐渐地在别的民族中进行。”^①广西壮族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之一,也提出了创制文字的要求。壮文当时作为国家唯一的试点,起步较早。作者受国家派遣,担当起调查研究壮语方言和为壮族创制文字的重任。创制文字首先要了解语言情况,尤其是方言分布情况。于是他带领一批壮族知识青年,转战广西各地,开展调查研究。他一方面了解各地学校语文学习的情况、困难和要求,一方面记录各地的壮语。与此同时,他还手把手教青年人掌握国际音标和记录壮语的本领,教他们分析和整理壮语资料。由他调教出来的一批壮族知识分子,后来都成为壮语文研究、教学、编译、管理等方面的骨干和专家学者。他的《广西壮语方言分布概况和创制文字问题的途径》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成的。

文章明确提出他为壮族创制文字的具体意见。文章指出壮语分南壮和北壮两大方言。在分析了两个方言语音上的具体差异后,作者认

^① 见第三次全国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民族语文政策摘编》,1997年。

为：“要选择一个(只有一个!)中心地点的方言作为标准来制订拼音文字，是太勉强的硬性办法。”他说：“民族语内部方言间或大或小的差别，在一个民族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形成以后，还会有一定时期的存在，只是标准方言处于领导地位，让各小方言服从自己，并在可能范围内吸取各小方言优点来丰富自己。方言文学也不应阻挠，倒不妨多加鼓励。……来宾和丽江两个方案尽量汇通，同时并进，暂时不教一个服从另一个也可以，这样可以适应农民学习文化的普遍要求并减少推行中的困难。”作者的思想非常明确，即为了“适应农民习文化的普遍要求”，不应该“勉强”“选择一个中心地点作为标准来制订拼音文字”，而是两个方言代表点的方案“同时并进”，待条件成熟以后，对壮语“进行普遍深入的调查，编写和出版壮语方言比较字汇和壮语语法”，而“广播、电影、文艺……的发展和普及，会帮助建立标准方言的权威”，然后再“建立壮语统一的文字”。作者这个从实际出发、分两步走的文字创制理念没有被采纳，最后是在“苏联经验”的指挥下，采取了作者所不赞成的“太勉强的硬性办法”，选择了南宁附近的武鸣作为创制壮文的标准音点。这使以后在壮文推行过程中走了许多弯路，出现了难以逾越的困难。

作者然后写了另一篇文章《壮族语文问题》。可以看出，这篇文章是作者在壮区开展了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在这一调查研究中，不仅记录了语言本体，而且大量观察了成人扫盲教育、小学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有意思的是作者在文章一开头就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内容，用国际音标拼写了壮语两个方言代表点的壮语读音，一个是来宾方言，另一个是龙津(今龙州市)方言。作者的意思与上一篇文章是一脉相承的，他希望将来创制的壮文可以将音标转写成文字，同时也让读者了解了壮语两个方言在语音和词汇上的差异。通过调查研究，文章对壮族人民需要本民族的文字给予充分肯定。他说：“壮族人民无论男女老幼，要求学习汉语文的热情空前地高涨。有些人就想，索性让他们抛弃自己的民族语言，直接学习汉语文，倒也省却许多麻烦。语文毕竟是工具，要是换一套更锋利的工具，对于使用者是有利的。但是历史的事实证明，聚居的民族在长时期内决不能忘掉自己的语言；如果自己的语

言不能变成锋利的工具,要直接学习另一个民族的语言,往往是事倍功半,而且按目前壮族的农民终年劳动的生活条件看,也许是不可能的。”作者冷静地分析:“过分夸大或低估壮语方言分歧所能引起的困难,都是不正确的。方言分歧的民族要建立一个全民的文学语言往往要经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

作者关于文字问题的另一篇文章是《坚持字母的汇通原则》。1957年冬,关于中国语言文字问题有两件大事发生。一件是11月1日国务院第60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公布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决议^①,另一件是同月29日国务院第63次会议讨论通过了对“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关于讨论壮文方案和少数民族文字方案中设计字母的几项原则的报告”的批复。^② 作者的文章,是在这两个文献公布后写的。壮文经过国务院讨论通过,批准为正式文字,并作为国家4种重要文字(蒙、藏、维、壮)之一在人民币上使用。这对为壮文辛辛苦苦工作了近10年的作者来说,当然是值得庆贺的大事。他的文章一方面是表示拥护通过的方案和批复,另一方面对批复中涉及的一些原则,结合壮文方案中一些字母的设计问题做了一些说明。国务院批文中说,“同意关于少数民族文字设计字母的五项原则。今后少数民族设计文字方案的时候,都应按照这些原则办理。”^③ 五项原则第二项规定,“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相同或者相近的音,尽可能用汉语拼音方案里相当的字母表示。”这就是作者文章中指出的字母汇通的原则问题。文章对汇通做了精辟的分析和解读,他说:“所谓汇通,根据我的了解,就是同样的字母代表同样的或相当的音位或音素。汇通的目的和作用是为了互相学习。”作者在文章中还讨论了汉语方言记录符号中的汇通问题。

① 见第三次全国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民族语文政策摘编》,1979年。

② 批准的原则共5项,简称五项原则。

③ 见国家民委文化宣传司编《民族语文政策法规汇编》第33—34页,民族出版社,2006年。

五 论文一组(3)导读

这组论文包括《武鸣壮语词法初步研究》、《壮语/r/的方音对应》、《汉壮语体词向心结构》等3篇。它们是作者长期调查研究壮语的心得。作者在文章中多次提到,壮文创制以后,为了各地不同方言区的群众学习壮文,推行文字的进一步工作是要“完成壮语方言词汇,农民课本一套和通俗读物三四种,小学课本的全套,小学后期的汉语文课本一套,壮语会话和壮语对照读物三四种,壮语常用词汇和壮语语法纲要”。据我们了解,这些工作都一一在壮文推行过程中落实并完成了。其中“壮语语法纲要”就是作者与他的发音合作人张元生^①合作完成的。众所周知,新文字方案一旦推行,除了课本以外,最重要的是要有辞典和语法等参考书,否则教科书的编写会缺乏规则和依据。《武鸣壮语词法初步研究》^②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完成的。大家知道,壮文最后是以南宁附近的壮语武鸣话为标准音点的,因此写一部简明扼要地描写标准音点的语法纲要,对当时正在如火如荼地推行壮文的民族语文工作队伍来说是多么的迫切需要,这真是雪中送炭啊!作者作为中国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第一工作队^③的队长,深知此项工作的重要性,他义不容辞地承担了此项重任。初稿于1956年完成后,刻印成油印稿,在中央民族学院壮语班试讲,并征求了丁声树、傅懋勋、岑麒祥、魏建功等语言学者的意见,最后修改定稿。作者的这种对工作一丝不苟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们这些后来者。

此文实际上是一部介绍壮语简明语法纲要的教科书。书中介绍了

① 有关袁家骅先生等记录壮语的详细情况,见《罗常培文集》第9卷第303页,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年。

② 此稿同时以《壮语词法初步研究》为题,收录在《少数民族语文论集》第1集,1958年。

③ 第一工作队的任务是调查研究侗台语族语言,并为需要文字的民族创制文字。详情请参阅孙宏开《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回忆片段》,载郝时远主编《田野调查实录》117—135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